

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6.01.002

#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实践路径研究\*

常庆欣,陈鸿池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创新驱动与资本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的核心动力链。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在于巩固已有的建设成就与体制优势,更在于突破结构性掣肘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升级。坚持党的领导,保障改革方向与制度执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互补;锚定创新新质生产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创新体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形成高效资源配置与风险控制机制。通过这一系统化实践路径,使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制度完整性、动力持续性和抗风险韧性上实现整体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领导;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1-0014-09

## 一、引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改革中具有统领性和方向性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up>[1]</sup><sup>17</sup>。党的二十大作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sup>[2]</sup>,强调其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家长远目标紧密相连,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sup>[3]</sup><sup>18</sup>,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up>[3]</sup><sup>16</sup>。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高

\* 收稿日期:2025-11-2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2024JZDZ006)“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简介:**常庆欣(1977—),男,河南鲁山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陈鸿池(1999—),男,福建泉州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常庆欣,陈鸿池.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路径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1):14-22.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up>[4]</sup>,并将其纳入“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安排。这一系列战略部署彰显了党中央对于制度建设、发展方式转型与治理现代化的深刻考量。

随着战略部署的持续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进入“加快落实”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发展方式转换、经济结构升级和治理体系完善进入深水区,现代化进程对制度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体系需要更加成熟、资源配置需要更加高效、政府治理需要更加现代化。这些任务在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通过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把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动力、活力与秩序有效整合起来。因此,如何在既有基础上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制约经济发展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已经成为事关我国现代化进程全局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从制度逻辑和结构性因素出发,系统分析近年来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展及其进一步推进的实践要求,探索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加速推进的突破方向。

##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大进展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不仅体现在制度模块的逐项完善,更体现在若干核心领域的系统性推进中。这些领域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共同形成经济体制现代化的基础框架。所有制结构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资源流动和商品交易提供规则和秩序,保障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和可预期性;创新体系的建设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保持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动力源;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既承载资源跨主体、跨时间的有效配置功能,也承担风险分散与防控职能。新时代以来,这些相互支撑的核心领域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也把需进一步克服的深层结构性障碍凸显出来。

### (一) 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经营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其中,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只是所有制结构中的比例关系,而且是一种功能性安排,旨在通过国有经济控制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发挥国有经济“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市场能够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国民经济运行的活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持续优化,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格局。国有经济在能源、交通、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保持控制力和引领力。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电建等掌握着国家能源安全的命脉;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承担了国家重大工程与“一带一路”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国有控股企业,在移动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中持续引领。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sup>[5]529</sup>,在稳定经济、增加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经济在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领域布局加快,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62.4亿美元,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sup>[6]</sup>。

然而,不同类型经营主体仍然存在失衡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有待完善。“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规模大,一些企业资产收益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同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要求不相适应。”<sup>[5]741</sup>部分国有企业在权责划分和治理模式上存在模糊,社

会职能与经济目标界限模糊,导致企业经营缺乏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尤其是在大型垄断性行业中,部分国有企业仍然带有一定行政特征,限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市场应变能力,造成部分领域出现效率损失和投资冗余。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存在结构性障碍。“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sup>[5]532</sup>“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sup>[5]532</sup>尤其是在能源、电信、金融、公共事业等战略性行业中,民营企业仍然面临不平等竞争。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口头鼓励、实质限制”的现象,这种隐性壁垒使民营企业难以公平参与竞争。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部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信贷歧视和风险偏好倾向,对民营企业普遍要求更高的抵押担保与信用等级。

## (二) 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完善,“内卷式”竞争有待进一步破解

高标准市场体系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撑机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sup>[1]19</sup>其中,产权保护的核心是明确资源归属与收益分配;市场准入安排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和营商环境建设,能够确保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平等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安排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只有竞争是公平的,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

从总体上看,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第一,产权体系持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一系列制度文件的出台,使产权保护的法治化、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各类经营主体产权边界更加清晰。第二,公平竞争体系逐步健全。我国建立了涵盖市场准入、公平交易、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政策体系。2021年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正式实施,同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防止行政性垄断与地方保护主义,多个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不断完善。第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稳步推进。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逐步建立。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范围扩大;资本市场改革加快推进,注册制全面实施;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跨地区流动障碍不断减少。第四,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增强。建设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市场主体的信用约束显著增强。

然而,当高标准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完全长期稳定可预期的结构时,经营主体仍然可能在短期激励下陷入“内卷式竞争”。这是指在资源、需求相对有限的条件下,经营主体为了争夺有限份额而陷入过度竞争,导致效率下降、创新受限、收益递减的状态。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部分传统制造业和消费产业中,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企业主要通过价格战、营销战等手段维持生存,而不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方式来提高市场份额,使原来已经产能过剩的领域进一步陷入恶性竞争。第二,在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产业中,大量企业在缺乏差异化技术与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依靠资本扩张、营销投入和价格战维持市场份额,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和创新投入被挤出。第三,地方政府政策同构导致资源错配。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往往在产业布局上“同向发力”。地方政府之间的招商竞争过度、政策优惠重叠、产业扶持重复,造成财政负担加重和投资效率下降。例如,部分省份在新能源、半导体、化工等行业的项目审批中存在“盲目扩张”现象,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项目闲置率上升。

### (三) 国家创新体系加速构建,创新生态仍需走向整合协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sup>[7]</sup>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科技战略布局,完善创新体制机制,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第一,国家创新体系持续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突破,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6万亿,基础研究经费为2500.9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企业占全社会经费投入的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75%以上,对全社会经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1%<sup>[8]</sup>。第二,创新产出和科技成果数量大幅增长。我国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480万件,国际专利申请量(PCT)连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一<sup>[9]</sup>。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6.3%<sup>[10]</sup>。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40%<sup>[11]</sup>。第三,科技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国家设立“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强化创新资源的竞争性配置。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治环境显著改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自主权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评价机制逐步向“重质量、重贡献”转变。

然而,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基础研究在R&D经费总投入中仅占6%~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核心材料等领域,“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sup>[5]807</sup>第二,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衔接不畅。“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资源分散、重复。”<sup>[5]810</sup>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信息壁垒明显,科技成果供需匹配机制不健全。大量科研项目雷同,导致创新资源分散、效率低下。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实施率较低,部分科研成果未能有效进入产业化阶段。第三,创新主体动力机制不健全。部分国有企业内部创新激励不足,民营企业创新存在短期化倾向,部分企业以追求资本回报为导向,而忽视长期技术积累。科研院所绩效考核以论文数量和项目经费为主,缺乏对原创性成果和应用价值的有效评价。第四,创新生态体系尚未形成良性循环。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科研成果资本化渠道不畅,创新失败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

### (四) 资本市场体系更加健全,资本运行的韧性仍需提高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sup>[5]717</sup>。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功能日益完善,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资本市场体系更加健全。第一,金融体系结构更加完善。截至今年6月末,银行业总资产近47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股票、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规模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sup>[12]</sup>。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金融业态由传统信贷型向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型逐步转变。第二,资本市场功能持续增强。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新兴领域发展迅速,为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 and 重点战略产业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近5年来,我国银行业保险业通过信贷、债券、股权等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科研技术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年均增长27.2%、21.7%、10.1%;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万亿元<sup>[12]</sup>。第三,金融基础制度建设持续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由分业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转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协同监管框架更加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期货和衍生品法》《金融稳定法(草案)》等法规陆续出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金融科技(FinTech)广泛应用于支付清算、风险管理和普惠金融领域,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为金融安全提供了支撑。

然而,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张,资本运行风险也在逐渐积聚,“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sup>[5]710</sup> 第一,资本“脱实向虚”。部分资本市场融资脱离实体需求,存在资金空转、金融套利等现象;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不足;科技创新型企业面临“高估值、低支持”困境。第二,房地产金融风险尚未完全消除。房地产金融的“高杠杆—高风险”特征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潜在压力;部分房企流动性困难尚未彻底化解,涉及信托、银行、债券等多渠道金融风险。第三,金融创新与监管滞后并存。金融科技在推动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歧视、数据安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等新型风险。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风险隐蔽性强、传导速度快,容易引发局部性风险事件。第四,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美联储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及地缘政治紧张,对我国金融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和汇率稳定造成冲击,资本市场面临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

### 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破方向与关键举措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直面制约国民经济运行和结构优化的深层问题。统筹好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要素,实现好效率、创新、公平与安全的有机统一。从制度逻辑上看,党的领导是体制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它确保市场化改革方向正确、政策执行有力,并能够把国家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制度安排与行动方案;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化发展与经营主体活力的充分激发,是资源配置效率与制度优势发挥的关键;创新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资本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则直接关系到资源跨时间、跨主体的有效配置以及风险防控能力。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这四个维度上实现系统性突破。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sup>[4]</sup>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理解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是简单的政治外壳或动员手段,而是实质性地重塑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sup>[13]</sup> 第一,党的领导能够确保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党的领导通过宏观调控和制度安排,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功能,同时使经济增长更好服务于人民利益,保障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与公平性,确保市场化改革不偏离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要求。第二,党的领导能够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统一。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碎片化、短期化的经济决策,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中发挥最大效能。第三,党的领导能够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组织执行力。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市场无法单独承担系统布局与统筹协调的职能,必须依靠党领导下的政府力量进行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制度化、法治化、常态化的领导机制,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效能。第一,坚持制度化的领导机制。将党的战略意图、政策目标与经济运行机制对接,形成明确的决策程序、责任体系和执行标准。针对重大经济战略和政策方

向,建立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确保决策程序科学、责任分工明确。在产业政策制定、科技创新布局、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建立制度化评估、审议和反馈机制,使党的战略意图能够通过制度落实到具体政策和项目中,提升治理效能。第二,坚持法治化的领导机制。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明确政府职能边界、经营主体权利义务,使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随意性,实现政策执行有章可循、市场经营主体行为有法可依,使党的领导与市场经济运行形成有机契合。第三,建立常态化的领导机制。推进政策调整和制度优化的常态化,建立常态化数据监测体系、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评估体系、宏观调控决策例会制度,使党的政治优势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效能和风险防控能力。

## (二)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好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失衡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sup>[4]</sup>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sup>[4]</sup>第一,建立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sup>[5]337</sup>。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发挥的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要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明确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主责主业,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拓展民营企业的发展领域<sup>[14]</sup>。推动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放大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和监管体制,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对象转变为国有金融资本,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运营的行政干预<sup>[15]</sup>。以“管资本”为主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推动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sup>[15]</sup>。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sup>[4]</sup>第一,要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生产经营、权益保护,把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突出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见性<sup>[14]</sup>,从法律和制度上把国企和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切实落下来。第二,要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民营企业平等准入、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的方针政策,使民营经济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回应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sup>[14]</sup>,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破除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第三,要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经济公平开放。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能源、交通、水利、市政、通信等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支持有

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民营企业在促进技术创新、支持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 (三) 创新新质生产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锚定创新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sup>[4]</sup>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sup>[16]</sup>企业具有推动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强大激励<sup>[17]</sup>,企业对于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攻关方向有着最深刻的了解<sup>[18]</sup>。一方面,要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面向市场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协同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sup>[19]</sup>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最高级的形态是政府在其中全面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sup>[18]</sup>。政府要突出国家战略需求,在战略规划、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上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通过规范的市场秩序和健全的技术、资本和人才市场,引导资源向创新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确保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sup>[20]</sup>。我国各地自然资源、科技能力、产业基础、人才结构差异明显,各地要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方向,使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与地区条件高度契合,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制造业基础雄厚地区,要立足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推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技术改造,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资源丰富型地区,要依托丰富的能源、矿产和空间资源,发展新能源、新型储能、氢能、先进煤化工等产业,加快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农业大省和广阔乡村地区,应以数字技术、种源科技、智慧农机为引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乡村特色产业。生态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则要发展文化旅游、康养服务、生态经济等特色产业,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 (四)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资本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资本天然具有改进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技术的内在冲动。资本自发地从低利润率领域流向高利润率领域,客观上也促进了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领域集中。然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sup>[4]</sup>加快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

健全资本运行体系,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第一,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明确市场准入、企业退出、信息披露等市场规则,让资本在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下活动,提高资本运行的效率<sup>[21]</sup>。第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健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

能,促进资本良性发展<sup>[22]</sup>。第三,建立风险防控防治机制。通过金融监管、产业链监测、跨部门协调和重大项目评估,实现对资本流向、金融杠杆、市场集中度和潜在风险的动态管理,保障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

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与长期投资。第一,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通过国有资本重点投资关键技术、核心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金和社保资金参与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科技创新项目建设,形成示范效应引导资本跟随进入。第二,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配套扶持。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绿色发展基金和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对长期投资项目给予融资便利和信用评级优势,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优惠、加速折旧,降低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和长期项目的积极性。第三,推动资本从都市流向县域,引导资本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设施、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仓储物流基地、高标准养殖圈舍、供水供气供热管网等农村基础设施<sup>[17]</sup>。

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相结合,强化监管协同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一方面,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相结合。中央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创新投资指南等顶层设计,明确资本流向、投资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为资本活动划定清晰的边界。地方则可以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特色,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和实施模式。另一方面,强化监管协同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建立金融、产业、科技、能源等多个领域跨部门协同机制,统一信息采集、风险评估和执法行动,避免政策碎片化和监管空白。同时,鼓励社会公众、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参与监督和评估,通过社会多元参与提升政策公信力与执行力。

规范资本不等于限制资本活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绝不是“一刀切”式地限制资本运动,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保证资本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sup>[21]</sup>,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使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序运行。引导资本健康流向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和长期投资领域,使其既服务于企业利润最大化,也为促进科技创新、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作贡献<sup>[21]</sup>,让资本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9.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1).
- [5]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6] 中国2024年引资总体情况良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1100亿美元[EB/OL].(2025-09-09)[2025-11-19].中国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2801485196708438&wfr=spider&for=pc.
-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94.
- [8] 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同比增长8.9%[EB/OL].(2025-09-29)[2025-11-19].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tech/20250929/6f227f73fb7d4f31bf91be499b51bc3/c.html.
-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截至今年9月 我国有效发明专利达480.5万件[EB/OL].(2023-11-08)[2025-11-19].央广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1984274750432114&wfr=spider&for=pc.
- [10] 制造业由大到强攀高向优[EB/OL].(2025-08-05)[2025-11-19].中国经济网,https://gxt.fujian.gov.cn/zwgk/xw/hydt/xydt/202508/t20250805\_6988216.htm.
- [11] 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EB/OL].(2023-08-23)[2025-11-19].https://www.cac.gov.cn/2023-08/23/c\_1694445809126283.htm.

- [12] 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位居世界第一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EB/OL]. (2025-09-23) [2025-11-19].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1749.htm](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1749.htm).
- [13]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02.
- [14] 刘伟.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J]. 治理研究, 2024(5): 4-10, 157.
- [15] 孟捷. 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资本[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2): 103-110.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98.
- [17] 谢富胜, 江楠, 匡晓璐.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4(5): 1-13.
- [18] 刘元春.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23): 28-35.
- [19]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8.
- [20]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5-05-02(01).
- [21] 张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篇章[J]. 经济研究, 2025(2): 5-19.
- [22] 张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再认识[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8): 22-41, 204-205.

##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CHANG Qingxin, CHEN Hongchi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a pivotal mission for deepen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Under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ptimized resource allocatio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the healthy growth of capital constitutes the core dynamic chain for moderniz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system involves not only consolidating past achiev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but also overcoming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o achieve a systemic upgrade. The practical pathway entails: (1)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to safeguard the reform direction and ensure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2) unswervingly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ublic sector and unswervingly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 to invigorate all market entities and harness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3) anchoring efforts in innov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build a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and (4)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o establish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obust risk-control mechanisms. Through this systematic practical pathway,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ll achiev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in institutional integrity, sustained dynamism, and risk resilience, thereby providing a solid underpinning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rivate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责任编辑: 李栋桦)